



田全金 · 著

Yan Yu Si de Yuejie  
Tuosituoyefusiji Bijiao Yanjiu

言与思的越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田全金 · 著

# 言与思的越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 田全金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309 - 06991 - 4

I. 言… II. 田…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文学研究 IV. I512. 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9027 号

## 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田全金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

责任编辑 庄彩云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 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991 - 4 / I • 526  
定 价 22. 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倪蕊琴

田全金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约我为他的书写序,这使我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我既不是他的导师,而且退休后十余年来可以说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但我又觉得难以拒绝,因为我们似乎有些缘分。他是我校中文系1982—1986年的本科生。三年级时他写了一篇题为《灵魂的痛苦与卡拉马佐夫气质》的学年论文,分工由我辅导评阅。当时我觉得年轻学生能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这一深刻主题很不容易,就鼓励了他,此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毕业论文《病态与文化选择》,我很欣赏,加以肯定,并留下了印象。

摆在我面前的是田全金写的专著《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我读完后觉得,它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作家专论的模式,即作家生平和创作道路——分期概述——代表作品专论。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所阐述的,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某一不同文化体系的外国作家时,如果没有新的视觉,就只能为这一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架桥铺路”,这一工程固然是重要的,而时至今日更需要探索“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放在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考察”。这种关系不仅涉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还要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和中国文学之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样,作者又进而以“主题研究”,即选取各国各时代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诸如性、婚姻、家庭、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超越实证”的对比研究。这种勇于探索、创新的态度值得提倡。而且在专著中处处可以看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并加以精心梳理、分

析,这部分构成全书的中篇,应是专著的重点。

专著上篇《译介与接受》也是资料丰富、阐述清晰的优秀篇章,可以说,与论述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同类性质的文章相比,迈进了一大步。

专著下篇《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讨论的问题对于非基督教的民族来说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以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常被我国外国文学界所诟病,但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具体分析;只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宗教思想的态度有了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一个涉及面广,与社会、文化、哲学、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复杂问题,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不一。田全金在占有陀氏作品以及其他论述陀氏材料的基础上,对他作品中宗教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深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有益的。这种勇于探索、知难而进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也体现了我国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新特色,反映出时代所要求的创新勇气和大胆尝试;同时也启发了我的反思。我们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专业”外国文学工作者,例如我,俄语专业毕业,学的、教的、写的就是自己主攻的俄罗斯文学。当进入研究阶段后,想以中国学者的视野突破传统的苏式研究方法时,深感自己中文底蕴的匮乏,这时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前辈“非专业”的作家、学者们所写的外国文学论著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因为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领悟到这一点时我已年过半百,虽然也尝试了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触及了他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这一课题,但由于一直未能把握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仅仅为这一专题准备了材料,翻译了托氏论中国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的著述。在《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发表时,我在前言中曾流露出下一步的打算,连文章的题目都已想好:《托尔斯泰与孔孟老墨学说——兼论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并写出了提纲,但我始终未能完稿,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另外,我也感到自己没有年轻一代的勇气,在比较研究中苏文学进程时,怕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正如《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

一卷)所指出的不足之处：“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显然是初步的，有的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的层面上”<sup>①</sup>，其实，应该说，只有几篇文章切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自成体系，两条线平行，各说各话。

今天有了更好的研究氛围，可以自由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年轻学子有机会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充分发展余地，为中外文兼优创造了条件。我相信，今后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有更好的发展。

2009年6月于墨尔本

---

<sup>①</sup> 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309页。

## 序二

谢天振

收到田全金发来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一书的电子稿其实已经有些时日了,后来又收到了该书责编庄彩云专程送来的小样稿。但一方面是恰逢年终岁末,自己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和需要处理的杂事特别多,分身乏术,无暇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全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近几年来我比较多思考的是与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和学科建设有关的问题,对比较文学、对俄苏文学,相对思考得少了,一时竟不知从何处下笔写这篇序言,尽管说起来我本人还是研究俄苏文学出身的,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大多数时间也一直是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

诚如田全金自己所言,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田全金是我在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批两个比较文学博士生中的一个,所以作为他的导师,我清楚地记得当初他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全过程:从最初确定研究对象,挖掘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到整篇论文的结构,等等。记得当初全金告诉我他准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我首先是表示支持,因为我知道他对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文学在华东师大求学期间,已经有较深厚的积累。但与此同时,我也表示了些许担忧,因为陀氏其人其创作的研究在俄苏经典作家中不说是最难的,至少也是研究难度最大的作家之一,更何况新时期以来,国内俄苏文学界已经推出了多部引人注目的陀氏创作研究专著,后继者该如何才能在陀氏创作研究中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并写出新意,这对全金的博士论文写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过后来的写作进程和结果表明,全金完全有能力应对

这个挑战。不仅如此,他还出色地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挑战。

首先,他在全面梳理和审视了国内外(主要是俄苏)此前的陀氏研究成果之后,决定借助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主题学和比较诗学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切入点,并由此展开他对陀氏本人及其创作的全方位研究。这样,整篇论文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上篇“译介与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中篇“性·家庭·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扫描”和下篇“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从目前的书稿可以看出,这样的谋篇布局和研究角度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陀氏创作的全貌和特征,同时凸显中国学者的独特研究立场,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在上篇“译介与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里,全金并没有满足对陀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作简单的历时梳理,而是在简明扼要地叙述陀氏在中国的译介史的基础上,运用当代翻译学中的操纵理论,深入揭示和剖析了陀氏作品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译介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譬如,尽管1949年以前,陀氏的作品大多都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在进入50年代以后,对陀氏作品的新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局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三种作品上。之所以如此,作者指出,是因为“唯一赞助人(政府当局)已不再热心支持陀氏的译介”。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在统计陀氏作品中译的数量时,并没有孤立地局限在对陀氏作品译介数量的统计上,而是还把它与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数量进行了横向的比较,这就帮助读者能对陀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认识。

再次,本书中篇“性·家庭·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扫描”不仅展示了作者对陀氏作品的娴熟深刻的把握,同时还显示了作者在中西文学、文化方面的扎实基础和比较深厚的学养。在这一“篇”里,作者熟练地运用中西文化理论,对陀氏创作的三大主题“性、家庭和知识分子”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譬如,作者在分析陀氏作品中“老年男子与少年女子的‘爱情’”这一主题时,对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中所作的分析进行了纠偏,指出弗氏“主要不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解释文学

现象，而是作为精神分析家为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论据”。与此同时，作者在考察了陀氏作品关于乱伦现象的描写及其个人的和历史文化的根源之后，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不仅史书上对这类事件语焉不详，文学作品也往往极力回避这个问题，至少对此缺乏严肃的探讨”。作者举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为例：杨贵妃本是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明皇是从儿子那里把她抢过来的，但我们的史书和文学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都隐瞒或掩盖了这一事实。如此开阔的研究视野对于读者深刻认识陀氏作品的特点和意义显然是有帮助的。

最后，作者在下篇“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中对陀氏与宗教哲学的关系这一最难把握的主题所作的深入剖析，则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在宗教学、哲学方面的理论积累和研究功力。这一“下篇”是当初参加答辩的博士论文中所没有的，是全金在完成博士生学业以后，利用教学工作的间隙，收集、梳理、消化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补写而成的。其实，他之所以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迟迟没有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主要也就是为了补写这一“篇”的内容，因为他清楚，要研究陀氏及其创作，陀氏创作中包含着的大量宗教哲学的内容“是无法回避的”。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这一“篇”里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陀氏创作中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而是把陀氏的宗教哲学思想放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加以对比阐发，从而展示了陀氏耿耿于怀的“恶”和神正论等问题在中国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视野里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面貌”。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全金的研究具有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深厚的中西文化积累。在我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有他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他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非常明确地指出：“大多数批评者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的题目，从社会、宗教、艺术结构、诗学等方面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而对于从中国文化视角审察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外国作家，没有给予足够自觉的关注。窃以为，就俄国文学而论俄国文学，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项工作虽然意义重大，但由于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者对陀氏创

作的解读很难达到俄国学者甚或西方学者的深度，某些‘深度研究’也往往是介绍性多于创造性。这不能不说这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无奈。”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研究道路，也就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放在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揭示出这位俄罗斯作家“焕然一新的面貌”。“这正是中国学者的长处，同时也是俄国学者没有做、也很难做好的课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取得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田全金的这本著作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示。

是为序。

2009年12月31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 目 录

序一 .....	倪蕊琴(1)
序二 .....	谢天振(5)
导论：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1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及批评界对他的阐释 .....	1
二、本部论著的构思 .....	13

## 上篇 译介与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

<b>第一章 翻译和传播</b>	
——陀思妥耶夫斯基汉译史简述 .....	20
一、20世纪前期 .....	20
二、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 .....	27
<b>第二章 翻译的政治</b>	
——陀思妥耶夫斯基译介的文化分析 .....	43
一、社会环境与文学翻译的选择 .....	43
二、翻译即操纵 .....	48
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	54
四、从文化到美学：瘦身术与鸵鸟战术 .....	59
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	66
<b>第三章 接受与批评</b>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中国 .....	71
一、初入中土“为人生”：1918—1949 .....	71
二、社会学语境中的“两面人”：1950—1989 .....	83
三、走进新时代的“先知”：1990年之后 .....	89

## 中篇 性·家庭·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扫描

### 第一章 人性的张扬和压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性主题 .....	100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解析 .....	100
二、“神女情结”与男性话语 .....	107
三、爱与恨的三角 .....	114
四、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与人“性”的毁灭 .....	129

### 第二章 “家”的扭曲和变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家庭主题 .....	140
一、婚姻家庭与金钱、爱情 .....	140
二、夫妻关系与女权主义 .....	149
三、肉体之父与精神之父 .....	159
四、偶合家庭的社会意义与美学意义 .....	167

###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土壤和天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知识分子主题 .....	178
一、从“绝地天通”到根基主义:知识分子成为问题 .....	179
二、自由主义与虚无主义 .....	187
三、暴力革命与知识分子犯罪 .....	195
四、深入“民间”:根基主义的美学意义 .....	203

## 下篇 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

### 第一章 和谐与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理性批判 .....	220
一、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 .....	220
二、约伯的痛苦和神正论 .....	225
三、“和谐世界”的自由与奴役——宗教大法官传说 .....	237

### 第二章 信仰与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实践理性批判 .....	250
------------------------	-----

一、“死去的基督”:犯罪与上帝的道德假设 .....	250
二、信仰、逻辑与精确科学 .....	260
三、否定的精灵——伊凡·卡拉马佐夫 .....	269
四、信仰与自由意志:圣愚和癫痫 .....	277
<b>第三章 沉沦与救赎</b>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拯救神学 .....	286
一、地下室、沉沦与知识分子 .....	286
二、救赎、神女与敌基督 .....	295
<b>参考文献 .....</b>	<b>308</b>
<b>后记 .....</b>	<b>313</b>

## 导论：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作家，但是，随着其作品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和传播，他的创作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他的作品不仅在俄罗斯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学者的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对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如此，他的“逻辑的自杀”已经演变为“西绪福斯神话”，验证着存在的荒谬和人世的隔绝<sup>①</sup>；他本人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sup>②</sup>；他所创造的“死屋”、“地下室”等概念，已经广为流传，为后世作家所继承<sup>③</sup>，甚至已被畅销书作家所利用，尽管这些畅销书的内容与他关系不大<sup>④</sup>。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思考，则成为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因此，陀氏对于当代世界的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及批评界对他的阐释

时至今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学人熟知的作家，但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对他的创作历程作一番简要的回顾，仍

<sup>①</sup>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92—399页。

<sup>②</sup> J·M·库切《彼得堡的大师》(1994)，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③</sup> 马卡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旗》1998年第1—4期。

<sup>④</sup> R·L·斯坦《死亡之屋》和《远离地下室》，接力出版社2002年版。被译为31种文字，全球销量2.5亿册。

然是必要的。

184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立即受到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左翼批评界的赞赏，一时之间被誉为“新的果戈理”。作家本人也昏昏然飘飘然起来，预言自己前程似锦<sup>①</sup>。深受鼓舞的作家很快又写出了《两重人格》。这两部小说均于1846年发表。这两部作品开启了陀氏创作的基本方向：《穷人》开启了作家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小人物心理尊严的主题；《两重人格》则在继续“小人物”主题的同时开启了对变态人格的探讨——对陀氏而言这成了更重要的主题。这一方面说明作者认识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都是明朗可爱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在形式上日渐远离自然派的创作规范，正在开辟一块独特的沃土。随后，作家相继创作了《女房东》、《白夜》、《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等富有幻想色调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和批评界大多理解并赞赏《穷人》的倾向，而对变态人格和幻想色调进入文学却多少有些不理解。1849年至1859年，由于逮捕、审讯、苦役、流放等严重的政治迫害，作家的创作被迫中止了。十年之间，外部自由的剥夺并未导致思想的停滞，相反，作家获得了直接介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加深了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于是，他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前途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逐渐背弃了早年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后世的革命者往往据此对他大张挞伐，似乎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但平心而论，陀氏早年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既然是“空想”的，就注定不能完成解放俄罗斯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深入到生活中、真正理解社会现实的革命者和思想者，都必然要背弃它，另外寻求改造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在流放期间开始创作的《死屋手记》，不仅记录了他在苦役营里的生活，而且记录了他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从此之后，陀氏创作登上了新的台阶，开始深入研究社会犯罪问题。杀人、抢劫、卖淫和自杀，等等，与知识分子的理性犯罪纠缠在一起，充斥了陀氏的小说世界。

<sup>①</sup>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下引陀氏书信除特别注明外均据此书。

在流放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贵族身份和写作的权利。《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这两部中篇小说于1859年发表，是陀氏创作中最轻松的作品。19世纪60年代初，陀氏创作并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两部长篇小说，同时主编《时报》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作品，提出了“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译土壤主义）的政治文化主张。根基主义是对早年思想的一次清理或清算。这一时期完成的长篇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批判。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自然派作家那样仅仅以批判社会现实为己任，而是试图深入批判人性本身的“恶”，探讨克服“恶”的途径。在作家看来，普遍存在的犯罪和黑暗现象，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恶果，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是作家由社会批判转向“人的批判”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由“性格”的形象到“思想”的形象的转折点。法国作家纪德称赞这部小说是陀氏“文学生涯的顶峰……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sup>①</sup>。这种说法虽未必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部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人性、理性的深入思考，对利己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猛烈批判。从此开始，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有关宗教哲学的长篇大论的探讨，日益成为陀氏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人性的这种思考和探索使陀氏作品远远不同于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或黑幕小说。从1866年到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发表了《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2）、《少年》（1875）、《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等五部长篇小说。这五部巨著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它们所具有的精神震撼力，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将以这些主要作品为材料。

在1873年，1876—1877年，1880年和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

---

<sup>①</sup> 赫尔曼·海塞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下引该书均据此版。

还以《作家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大量的随笔和政论,阐述自己对文学、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些作品以及为数颇多的书信,为我们分析研究陀氏创作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1883年,俄国出版了第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26—1930年,出版了13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全集”;1930年,出版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1956—1958年,出版了一套10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1972—1990年,出版了30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74年又开始出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至2001年已出了16辑),补充“全集”遗漏的资料。

### 俄国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

最早对陀氏创作发表评论的是别林斯基<sup>①</sup>,他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突出了作家对小人物的同情、对小人物人格尊严的维护,以及从事细致的心理刻画的才能。别林斯基的观点为后来的革命民主派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sup>②</sup>等人所继承,奠定了俄国社会学批评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苏维埃时代的官方美学。

苏维埃时代的批评家大多亦步亦趋地重复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审美或艺术上的创见不多,而对陀氏的批判则有过之而无不及<sup>③</sup>。难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政治理论学习都没有发生作用吗?当然发生了作用,但其作用的性质是很值得玩味的。张贤亮在谈到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政治学习时说:“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学习开会’,不是提高,而是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智力水平。”<sup>④</sup>

<sup>①</sup> 别林斯基《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彼得堡文集》等。

<sup>②</sup> 杜勃罗留波夫《被压垮的人们》(1861);皮萨列夫《为生存而斗争》(1867)。

<sup>③</sup> 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1956)。

<sup>④</sup> 张贤亮《小说中国》,经济日报·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